

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属性及其“负熵”实践路径

卢 岚, 孙 彤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数字时代“人-技术”的哲学思辨为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新维度。借助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主要观点, 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为一种在思想中领航定向的“传输技术”, 揭示技术属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生成逻辑、内在张力与外在表现, 以及其“负熵”潜能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契合。进而通过分析技术异化导致价值坐标偏移, 技术依赖加剧主体性消解, 虚实空间碰撞诱发立场失稳, 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熵增等风险, 提出“负熵流”治理三维矩阵框架: 通过技术素养培育形成主客体协同的认知免疫系统; 创新弹性嵌入机制, 以非线性教学模式重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 实现技术介入与人文关怀的平衡; 锚定价值理性内核, 在虚实融合中强化意识形态凝聚力, 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兼具理论纵深与实践效能的熵减范式。

关键词: 思想政治教育; 技术属性; 负熵实践; 斯蒂格勒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2-0172-09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50313115

Technical Propert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Practical Path of “Negative Entropy”

LU Lan, SUN Tong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philosophical speculation of “human-techn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has created a new dimension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the main viewpoint of Stiegler’s phenomenology of technology, this paper rega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a kind of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that leads and orients people’s thought, and reveals the generative logic, internal tension and external performance of technical attributes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rnal fit between its “negative entropy” potential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n, by analyzing the risks of value coordinate deviation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the aggrava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dissolution of subjectivity, instability of positions induced by the collision of virtual and real spaces, and the entropy increas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ystem, we propose a three-dimensional matrix framework of “negative entropy flow” governance: to form the cognitive immune system of subject-object synergy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technological literacy, to innovate the flexible embedding mechanism and reconstruct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cology with a non-linear teaching

收稿日期: 2025-03-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思政专项重点项目(24VSZ022);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专项课题(2023FZX009, 2025VSZ006)

第一作者: 卢 岚, 女, 教授。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与思想政治教育。E-mail: 2398329898@qq.com

mode, to balance techn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humanistic care, to anchor the core of value rationality, and strengthen ideological cohesion in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and real spaces, providing an entropy reduction paradigm with both theoretical depth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chnological attributes; negative entropy practices; Bernard Stigler

随着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创新升级,人类的认知边界在不断延伸的时间、空间维度中得以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长空间与实践场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1]这意味着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换言之,技术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外在化中介,更深刻作用于人的心理、记忆、认知,深刻影响着社会文化领域。然而,人类运用技术代具“增益其所不能”的同时,技术异化自治造成的社会文化系统无序,致使人类社会普遍进入熵增状态。如何运用技术属性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引领作用?如何避免技术滥用导致的异化与无序?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和探索。由此,本研究引入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理论,分析技术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探讨技术属性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独特价值,并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负熵”的实践路径。

一、跨界解释力: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链式反应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作为当代技术哲学领域的一位代表性学者,备受学界广泛关注。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汲取了胡塞尔的现象学、西蒙栋和吉尔的技术哲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现代自然科学等诸多思想资源,建构了一种关注当代数字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极具前瞻性的批判话语体系。他在教育与技术关系方面的深刻阐述,为本文的研究主题提供了丰富的分析视角。

(一) 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主要观点

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以“人—技术”的存在论结构及其延异运动为起点,揭示技术如何通过第三持存,既拓展人类认知又引发异化,最终在药理学与负熵中寻求技术批判与救赎的可能。

1. 技术与人相互作用:“人—技术”存在论结构及其延异运动

斯蒂格勒认为,技术性是人的本质与存在形式,技术与人相互发明^[2]。外置的、后种系生成的技术作为人的身体补缺的“代具”(Prosthesis),是人类自身进化及其社会生活变革的巨大动力。由此,围绕“人—技术”存在论结构发端了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技术的存在论意义使其成为斯蒂格勒一切哲学讨论的理论支点。

借用德里达延异(Différance)的哲学概念,斯蒂格勒在这里意指空间上的差异与时间上的延迟,在“人—技术”存在论结构内,人类受集体经验和记忆的影响永远处在技术的“过去”,时间上“滞后”的人不停追逐着“超前”的技术代具,永远处于“延异”运动之中。

人因技术性而存在,在试图操控技术的运动中也亲手培养技术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反过来驯化人类、筛选人类,因此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遮蔽住人对生存本质的理解。“人—技术”横亘于更新效率与理性生命之中而成为一种对立的表达,社会生活呈现的文化进化的程度远远落后于技术发展,即人与技术二者在做延异运动。

2. 作为第三持存的技术:对思想认知具有正反两面作用

本文所提及的“技术”及“技术属性”概念皆源于斯蒂格勒在技术现象学中的概念阐释。斯蒂格勒用“技术”这一概念泛指一切人类赖以生存的外在之物^[3]。这些事物所承载的历史性与时代性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于当下,在人类的生

存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胡塞尔的基础上,他开辟了不同于主体直接产生的、为增补人的不足而外在于人的物性记忆载体——第三持存(Third Retention)。从承载了信息的文字、语言,到储存声音的唱片、储存画面的电影,再到现代信息技术,这样可被反复读取、保存、编辑、传播,并使人在无限重复中不断产生新体会的技术,就是第三持存。在人类进化的历史进程中,个体存在过的印记乃至人类群体留下的文化记忆,以技术的方式得以传承,即“技术”作为“第三持存”而存在,这强调的是技术与思维、记忆之间的关系。

技术是一种具有正反两种特质的“药”。一方面,人在有组织、合规范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有着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对生活现存样态具有颠覆性,这种颠覆存在着积极与消极两面的可能:它既能积极地重新配置个人和集体的存在模式,促使个人与集体与时俱进;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筛选、淘汰掉“守旧派”,为社会分裂、文化失衡埋下隐患。换言之,其“解药”的意义在于,作为记忆的中介,技术能够重塑集体记忆、凝聚社会共识、培育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展现出强大的精神“治疗”潜能;而药的“毒”性则体现在,技术可能加剧系统的混乱和无序,导致熵增。因此,我们需要批判性地看待技术的作用,既要充分利用其正面作用,又要警惕和防范其负面作用。

3. 解读技术药理性与负熵

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在探讨技术对人与人类社会的影响时,其讨论范畴指向技术、身体和社会三个层面,三者密切交织、共同作用。其技术药理性在于将技术看作一味具有正反两种特质的“药”,体现了技术与人类共生存在、互相进化的核心思想。技术的积极作用即治愈性,能够为社会系统带来负熵,促进系统的有序和稳定;而负向作用即破坏性则导致熵增,加剧系统的混乱和无序^[4]。这两种特性并非技术天然携带,而是在技术对人类进行“补缺”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异化威力。因此,在这个动态变化中,技术被人类个性化的同时也在技术化人类,二者抗衡形成了内在张力,这种有序与无序的冲突引出了熵增问题。

“熵”描述了一个封闭系统中,能量会自发地从高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导致系统的无序

程度增加;而在开放系统中,通过吸收外部能量和物质,可以产生多元化的信息,促进系统的组织结构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抵抗不断熵增的社会现实——也就是“负熵”。

(二) 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与思想政治教育阈限

斯蒂格勒的技术现象学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了双重启示:从“记忆术”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的技术化运作,到以负熵成效拓展意识形态建设的治理维度。二者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在技术深度介入教育的当下,如何通过批判的负熵实践将工具理性转化为共识生产,从而在记忆传承与思想解放之间构筑动态平衡。这一逻辑衔接既延续了前文对技术药理性的讨论,又为思想政治教育开辟了跨学科对话的阈限空间。

1. 把教育作为“记忆术”的技术,为思想领航导向

回溯人类生产制造的历史,无论是工艺品、工具等被动传递记忆的载体,还是文字、照片、电影、音乐等主动存放记忆的痕迹,都是特定时代的见证^{[5]177},在技术进程中具有自己的传播幅度与时间长度。在此意义上,技术天然时间与空间的象征,是记忆的载体。斯蒂格勒认为,教育的功能性在于意识的传输与接收过程,它是一种能够在思想中进行导向的“记忆术”。教育影响着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以及集体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5]179}。它能在社会层面实现心理层面的个性化和集体层面的个性化,并为此目的提供精神层面的根本质料^{[5]186}。同时,教育在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的推动下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在探讨技术与教育的关系时,斯蒂格勒的“教育”并非一个确切的所指,而是一种大体的行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关于“记忆术”的技术,不仅承载着传承价值观念、塑造社会共识的重要使命,而且在其本质属性上展现出独特的技术“面相”。一方面,它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建设中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能够为团结全国人民共创美好未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由于人的“先天不足”需要通过技术代具来弥补,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更新发展也需要借助技术之力,其形式、内容以及规模等能够借助代具的辅助作

用得到优化和提升。

2. 基于“负熵流”理论,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引入“负熵”的可能性

技术作为外置器官与人类紧密相连,其熵增趋势必然会影响人体内在熵的平衡,导致人的熵化及一系列消极影响。然而,教育与文化是开放的系统,其内部蕴含着产生负熵的可能性。本文将“负熵”这一概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域,将其作为一种评价标准,以此看待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相结合所取得的成效。

思想政治教育的负熵成效意味着,通过辩证利用技术载体,能够降低教育过程中信息和知识传递的无序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效能。思想政治教育运用技术药理学的“治疗”潜能来克服技术的“毒”性负面影响,可以引导技术向善,促进人的主体性复归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平衡有序发展。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为个体与集体思想塑形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创新话语表达形式,在社会心理层面维护政治稳定。在存在论和功能性意义上,它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是一个传递主流思想观念与道德行为规范的技术性过程。它肩负着立德树人、传递主流价值观、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使命,能够在个体内部凝聚思想认同,促进个体对这些内容重新演绎、吸收内化,乃至实现代际传递。

文化通过传承历史、弘扬传统,为社会系统提供了一种连续性和稳定性。文化系统内部蕴含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重要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文化储存的重要载体,其负熵潜能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上。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人,同时为文化发展领航定向。思想政治教育秉持文化自信,批判吸收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调和多元文化的潜在冲突。在一系列旨在拓宽文化传播广度、确保文化保存连续性以及提升文化渗透有效性的技术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实现双向互动,凝聚起广泛的思想共识。这有助于焕发人的自主创造活力,且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特色、中国式现代化的实际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促进社会系统有序运行的负熵价值。

二、理论锐度: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 技术属性之认知边界

数字时代,要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结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首先回望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考察其技术属性的原始生成是否具备兼容未来技术发展变化的逻辑框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本性的、人对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技术属性天然地内置其中,并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现象、技术手段、技术环境之间的关联。

(一) 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属性的生成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作为“记忆术”的技术,作用于意识的传输与接收过程,能够在思想中进行导向,凝结符合主体意志期望的“共识结晶”^{[5]209}。在斯蒂格勒“人—技术”存在论结构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人—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属性的生成逻辑。

首先,“人—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活动的立体范式。人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的天然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就是一个“真”字,真正用科学的理论结晶引领人,用良好的道德品质垂范人,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熏陶人,让人成为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是人,立德树人是其根本任务;教育目标着力于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教学成果旨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具理性思辨力的“精神食粮”,引领人民群众走近真理。

其次,在“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视域内,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缺陷性存在”,为满足其“补缺”需要,寻得技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代具。从传统的字母文字系统、书本,到当代的数字技术,如虚拟现实技术、大数据、元宇宙等,这些技术不仅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还为课堂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们并非思想政治教育内生的组成部分,却成为教育手段重要的功能性延伸,即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代具”。具体而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功能,需要依赖这些外部技术手段,以此弥补传统教育模式中的某些功能局限。思想政治教育以其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教化性、政治性,在总体方向上保障个人

命运与国家发展始终紧密相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广泛凝聚发展动能。

循着技术第三持存的痕迹,人类将个体记忆储存至可改写、可重复查看的物性载体中,这些记忆变成代代相传的历史性记忆^{[5]177}。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作用于意识领域的表现形式之一,以教育的手段对知识进行继承与扬弃,正视历史的软弱与局限,在实践中不断推进教育内容创新性发展,使得人类文明进步成果得以延续。在进化视角中,它具有传播幅度与时间长度方面的特点^{[5]178};在意识领域,它具有心理层面的个性化和集体层面上的个性化功能,即教育的功能是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个性化^[6]。

“人”作为天然的联结纽带,为三者开辟了线性关联。教育存在着实现技术从“人的发明”到促进人的本质复归的积极可能。因此,携带技术属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可被看作一种良性影响中介,促进形成一种负熵的、有希望的人类生存样态。

(二) 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属性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反映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特殊状态就是矛盾,它从根本上揭示了事物内在的属性关系^[7]。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也是一对矛盾,二者的变化过程表现为“相互往返”的延异运动,构成其技术属性的内在张力。思想政治教育在对传统授课模式创新的同时,为回应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新的需要,倒逼技术不断完善、革新,以至引发自身新的变革……如此往复。

在这个动态变化过程中,技术被人类活动个性化的同时,也在技术化人类活动。既然以时代性和感召力为前进方向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与技术主动碰撞的过程中持续双向形塑,那么在以人为交汇点的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思想政治教育内部一定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不断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内部“补缺”需要的同时,将技术的优势转化为自身的一种属性,从而使自身完整。简言之,这种内在张力象征着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这两股力量的对立与融合,促使矛盾双方在不同历史时期相互牵引、抗衡,进而对主体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因这种内在张力的存在,技术更新速度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的适配过程不会是简单的、一帆风顺的,而是存在着短期个别领域的混乱无序与

长时期整体稳定有序的辩证统一。在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新旧时代交替时,会致使大量的熵产生。归因于技术进程中人类发展的永恒需求,思想政治教育永远存在向上的变革趋势,这种趋势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持续与时俱进。思想政治教育会追随技术趋势划定人文关切的红线,净化浮躁之风,哺育心灵,最大程度逆转技术的异化趋势及其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 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属性的外在表现

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属性需要在它与技术情境的动态关系中理解和把握。这种技术属性主要体现在教育活动构成的技术性、教育方法应用的技术性、教育活动过程的技术性以及教育评价体系的技术性四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成要素通常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教育者、教育对象以及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和教育对象都是具有技术属性的人,因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展开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然处在技术属性的系统之中。在思想政治教育内部,构成教育活动的三个基本要素并非孤立存在的实体,而是嵌入在一个技术化进程之中,成为彼此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的节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中介,不断被重新构造和再生产,教育内容也由技术调节和塑造。技术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生长空间,在这个环境中,技术不仅作为工具存在,还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条件之一,影响着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效果。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应用。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倾向于理论知识与道德规范的单向传授。然而,随着技术不断渗透并影响社会各领域,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有效补偿和改进。对教学方法的选择与更新,不仅影响着教育内容的传递效率与接受度,更成为驱动教育范式革新、促使教育体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重要动力。思政教师可以借助技术手段,帮助受教育者规划个性化学习路径,根据学习者的兴趣、认知水平和行为习惯,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互动性。例如,借助视频讲解和在线讨论平台,学生能够在课前自主学习理论知识,课堂上则通过互动讨论和实践活动深化理解;通

过在线平台,学生能够跨越时空限制,开展团队合作和知识共享。人工智能算法还能根据学习者的实时反馈,调整教学内容的难度和节奏,了解其价值倾向,为不同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上好一堂思政课,首要考虑的就是课程活动的设计。技术手段能够帮助教育者更加科学、系统地进行规划,利用分析工具和数据库资源,调取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兴趣爱好和知识重难点,从而编排出针对性强的教育活动,确保教学目标的有效达成。在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上,多重技术手段的联动进一步优化了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活动的实施。例如,线上学习平台和虚拟课堂的引入,便于学生灵活参与,可重复调取、利用学习资源。此外,技术手段还可以用于教育活动的实时管理和监控,有利于教育者把握教学进度,提高了教育活动的组织效率。在教育活动的实施阶段,技术手段的应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教育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视觉化处理优势,将复杂的理论概念以更加直观和生动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借助VR、AR等虚拟现实技术让学生进行沉浸式学习,提升教育活动的体验感和参与度,教育者能够适时调整教学计划,使教育活动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第四,教学评价体系。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技术属性还体现在对教育效果的量化评估上。通过构建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运用数据分析工具对教育活动的效果进行量化评估,可以客观反映教育的成效与不足,为教育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种“数据驱动”的评估机制,既促进了教育方法的持续改进,也有助于形成一份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教学案例。

三、时空皱褶: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技术风险与熵增困境

当技术狂飙般拓宽思想政治教育认知边界,制造学术奇点的同时,技术异化引发的三重危机,即工具理性扩张导致价值坐标偏移,技术依赖加剧主体性消解,虚实空间碰撞诱发立场失稳,也会促成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熵增现象。

(一) 工具理性模糊价值判断,教育主客体技术素养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在兼容数字化技术载体的同时,重视效率轻视价值的工具理性极易使自身面临异化与违背教育价值引领的风险。这种风险不仅源于对技术手段的过度依赖,更在于教育主客体在技术素养上的不足。教师若未能深刻理解数字化技术的本质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潜力,便可能盲目追求技术的新奇与高效,而忽视了技术背后所承载的价值观念与教育理念。同样,学生若缺乏必要的信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便容易被技术所牵引,丧失对教育内容的独立思考与价值判断。

技术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适应数字时代的契机,在教育与技术的互动融合过程中,教育主客体均需具备数字素养。国外学者在2010年将“技术素养”定义为个体运用通信技术工具进行信息检索、管理、整合、评估及创造的能力^[8],在学生运用技术工具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教育者若能在分析整合信息方面给予学生高效引导,让学生能够以专业且规范的形式展示学习成果,即可实现技术的有效应用。而高效整合信息资源、调整教学方法以解决教学实践中学生的多样性问题,正是具备技术素养的显著表现。在传统教育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普遍倾向于理论知识与道德规范的单向传授,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占主导地位,承担进行单向输入式教学的任务。然而,随着技术不断渗透并影响社会各领域,课堂不再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唯一场所。教育客体需求多样化,对思政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技术素养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起“传授”,更强调“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过程中的技术属性变得愈发显著,技术素养可看作强化教育效果、提升教育实效性的核心要素。倘若缺乏技术素养,教育主体权威则被解构,以致面临失去话语权的风险。

(二) 技术过度嵌入弱化主体功能,教育内容与技术发展不匹配

当前,技术进化的方向逐步由辅助人躯体所不能的“代具”性,转为对人语言风格、沟通习惯、思维方式等感性系统的模仿,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依赖技术进行教学和管理。当技术成为教育过程的主角时,教育者的主体功能便逐渐淡化,

如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引发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挑战与价值性挑战,不仅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温度与深度大打折扣,也使思政工作者面临被智能代替的风险。

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信息获取与传播的方式,而教育内容却往往滞后于这种变化。传统的思政工作者仅将技术作为传统课堂的辅助工具,导致教学内容与技术发展进程之间不匹配乃至出现“中断”。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仍然以原有文化产品作为主要内容输出,形成了一种对技术体系而言相对落后的文化风气,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只能被动地跟随外在化进程,将技术手段作为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先驱。另一方面,技术试图操控人们的意识,有一双“看不见的手”鼓励人们脱离生产与创造本身,而顺从模式化生产的产品和文化规范。个人表达的同质化导致个性与创造力丧失,造成身心灵的空乏感、迷失感,传统文化价值观亟待回归主线。

(三) 空间转换引发立场偏移,侵蚀意识形态根基

如今,数字化的到来为意识形态领域更新迭代出数字化持留载体,利用虚拟数字空间改写了人的社会风俗、交往方式、文化产品、教育理念等文化记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数字空间内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和影响范围相较于传统大众传媒更加广泛而深刻,数字化传输工业带来的技术滞后、数字鸿沟加剧了社会治理难度,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体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被数字符号消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出现潜在西化的倾向,这危害国家安全。全球化进程来势汹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文化产品着力向全球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大肆宣扬其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的同时,并力图运用影视、文字、书本等传输装置破坏本民族教育根基,造成本民族文化系统熵增。“网络中介着……各种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全球化流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9],思想政治教育在兼容数字化技术载体的同时,若放任重视效率轻视价值的技术逻辑也极易使自身面临异化与违背教育功能性和存在论意义的风险,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

四、三维矩阵:思想政治教育的“负熵”实践路径

技术对人本身而言存在着两面性,“解药”或“毒药”与否取决于人与技术打交道的具体方式^[10]。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为社会系统带来熵与负熵两种可能。既然技术可以“自动地而不是超个体化地形成集体第二持存”,思想政治教育就能够有发挥“负熵”潜力的可能,利用自身的技术属性。这种“解药”施力于社会心理的建立过程,是个体自主性与创造性充分涌流的条件,使人在个性发展与自由表达中潜移默化地维系在集体的一分子之列。因此,建构“认知—实践”双向赋能模型,通过技术素养培育形成主客体协同的认知免疫系统;创新弹性嵌入机制,以非线性教学模态重构教育生态,实现技术介入与人文关怀的相位平衡;锚定价值理性内核,在虚实融合中强化意识形态凝聚力,形成螺旋上升的负熵循环。该体系既承继传统方法论的稳态基因,又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实现教育系统的耗散结构优化,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兼具理论纵深与实践效能的熵减范式。

(一) 提升技术素养,培养教育主客体正确“三观”

当技术代具深度嵌入教育场域时,不仅重构了“人—教育—技术”的互动关系,更通过算法建模、数据画像、沉浸体验等技术特性,对教育主客体的技术观、价值观和实践观形成系统性冲击。为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立足自身鲜明的人文立场,培育正确的技术观、价值观与实践观。

第一,培育正确的技术观。技术不仅是手段,还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机器或许在效能上可以变得更快、更强大,但它们永远无法感知,更不会具备意识。技术带来的颠覆是不可避免的进程,它本身并无“好”与“坏”之分,必须认识技术的两面性,与传统技术的“解蔽”不同,现代技术在推动社会进化中觉醒了支配一切的愿望,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思想政治教育需要看到技术发展本质上带有政治性的价值立场,因此它必须被主流意识形态驾驭,并受到监督约束。

第二,培育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人们在认识各种具体事物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领,则必将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沼。然而,在技术中介紧密联结并驱动物质世界走向“数字化”与“算法化”之后,人们逐渐倾向于运用技术逻辑分析事物,并以此来衡量和评估个体生活的尺度。这样形成的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与个性化需求往往被技术框架所局限,照应着海德格尔所说的“无思”。我们的存在、思维和价值观是由环境塑造的,因此也受到技术和人工系统的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引导受教育者主动筛选并建立合乎自身发展需要的技术联系。如数字传播媒介与人的“过度连接”易导致感知的麻木与倦怠,反而滋生了人的疲惫、厌烦、无感等“负整合能量”。技术与生活的辩证统一,是在利用技术克服现实有限性的基础上丰富精神世界,助力自我价值的实现。

第三,培育正确的实践观。这里的“实践”主要指向人与技术代具的互动实践。当前,技术对生活边界的试探已经延伸至生产劳动以外的空闲时间,虚拟现实技术更加剧了人与数字技术关系的失衡,人的情感和理性思考都被简单提纯为数值符号,“现实的人”因此丧失了对现实与虚拟的分辨能力,沉沦其中难以抽身。若无法驾驭数字互动中可能出现的“时间极权”,则劳动无法表达本心,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状态将被无限延缓。数字实践中,思想政治教育要作为一种干预的手段,引导受教育者合理规划“在线时间”,防止过度“连接”,鼓励回归现实本真以形成生活经验,重视社会交往、个性养成,享有一种在自我控制状态下的可自由支配的生活实践。

(二) 调适技术嵌入程度,创新教学内容与重塑教师主体性

运用技术属性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需遵循“主导性优先、工具性从属”的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与现象学批判的双重视域中进行辩证调适。“工艺学揭示出……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11]。技术嵌入的本质是生产关系在教育场域的具象化,而海德格尔“技术座架”理论所警示的异化风险,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于“主体—技术”的存

在论结构之上。这种辩证逻辑决定了技术介入需满足双重约束:其既作为教学创新的催化剂,又需防止技术异化对育人本质的解构。

首先,技术代具存在无限趋近智能生命形式的可能性,这必将带来教育客体多样化的需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利用技术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开展衡量、把控技术介入边界的教育实践^[12],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内容。不仅要在工具意义上关注技术结合所产生的表层教育形式转变,更应突破思维局限,从学科视角将技术进化的正反两面影响纳入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中,探寻本体论意义下未来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在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大众化作出相应阐释,传递家国情怀。

其次,教师主体性的重塑是技术属性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及思政工作者尚驻足于附着在新技术之上的应用,难以对层出不穷的持留机制形成遴选的理性判断;更重要的是,这种状态限制着与受教育者建立认识论的教育形式,可能致使未来一代丧失表达个性、对事物进行批判反思的热情。思想政治教育掌握主导权,关键在于发掘思政课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相较于智能设施而言的不可替代性。要加强批判思维能力、反思创新能力与情感交往能力以铸就智能时代自身非物质价值属性^[13],通过新型技术基础设施为自身赋能,将技术代具融入自身教育生命,不断增强自身主体地位。

(三) 遵循价值理性,坚守人文立场与凝聚思想共识

当讨论技术进程对人类社会多维度影响,包括其发展脉络、深刻变革乃至潜在失序时,思想政治教育以其独特的“人本”属性,象征人文精神领域的复归。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线,其内部的生命尺度“遵循着生命逻辑而非机械的物化逻辑”^[14],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思想政治教育应尤其警惕以牺牲价值理性、人文精神和创造灵性为代偿的技术实践,将人文关怀作为教育的核心维度,以感性驱动感知,将人文关怀嵌入思想政治教育内核,开展“负熵”实践。

首先,必须明确技术是自然力的拓展,更是人性的延伸。在应对技术进程中的诸多挑战时,思想政治教育应坚守人文立场,辩证地利用“第

三持存”载体在技术工具与感性引导之间进行合乎数字时代的素养培育,从而激发个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创造活力,进而确保教育内容能够深入契合人们的感性经验,实现精神层面的再生产。这一过程不仅提升政治理论学习的质与效,更有利于个体精神世界的修复与提升,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线实现对人身心的积极塑造。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与文化的双向互动中铸就思想共识。文化产品作为民族主旋律的天然载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相连。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上生根发芽,其借助技术代具实现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继承与传输,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人,为个体与集体意识塑形,最终生成“共识结晶”,成为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的强有力武器。

“共识结晶”具体表现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方面。其与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是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调动全体人民积极性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聚意识形态共同理想的不竭之力。其文化属性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继承与传输,

五、结语

技术既是现代社会的“毒药”也是寻求解决之道的“解药”,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立场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摆脱社会系统熵增困境的有效途径。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传输与接收的双重机制,它作为一种“属人”的技艺,充分彰显了人文精神,应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背景与本民族文化传统,增强对技术持存导致的无意识状态及文化殖民风险的警觉,在技术进程中为社会系统构建稳定有序的状态。因此,增强对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属性的关注,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有助于应对现代技术在社会文化领域的冲击,为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J]. 旗帜, 2023(6): 8-9.
- [2]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1: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 裴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 [3] 张一兵. 人的延异: 后种系生成中的发明——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解读[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 57(3): 131-138; 207.
- [4] STIEGLER B.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On Pharmac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 [5]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3: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M]. 方尔平,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6] 邹红军, 柳海民. 斯蒂格勒论教育的本质、危机及其拯救[J]. 教育研究, 2020, 41(4): 63-76.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1.
- [8] CALVANI A, FINI A, RANIERI M. Digital Competence in K-12: theoretical models, assessment tools and empirical research[J]. Anàlisi: quaderns de comunicació i cultura, 2010(40): 157-171.
- [9] 陈清. 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中的中国思想政治教育[D].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 2004.
- [10] 许腾, 夏保华, 李艺, 等. 斯蒂格勒“第三持留”的教育哲学阐释——兼论数字时代的教育困境与应对[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 45(4): 18-24.
- [11]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12] 任凤琴, 董子涵.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风险与规避[J]. 理论导刊, 2024(2): 121-128.
- [13] 何菊玲, 牛雪琪. 论人工智能时代教师专业劳动的非物质价值属性及其不可替代性[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9): 98-106.
- [14] 刘济良, 马苗苗. 智能时代下教育的困境与坚守——基于生命哲学的视角[J]. 教育发展研究, 2021, 41(20): 1-8.

(责编: 程爱婕)